

***The Soldier and the Citizen: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aiwan's Development.* By Monte R. Bullard, New York: M. E. Sharpe, 1997.
223pp.**

台灣當代的經濟、社會與政治發展，在最近十年已經受到國際社會科學界的重視。有關經濟發展、社會變遷、以及政治民主化的研究，如雨後春筍般，令人目不暇給。但是，對於維護台灣安全並奠定發展基礎具有重大貢獻的軍隊，有關的研究仍然極為貧乏。傅岳(Bullard)博士這本著作的出版，為這個新的研究領域開啓了新的一頁。

本書旨在指陳，中華民國國軍於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，在「政治社會化」(political socialization)方面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，因而對「國家整合」(national integration)、「國家建構」(nation-building)，甚至後來的民主發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。首先，在第二章，作者指出國民政府於 1949 年遷台時所面臨的艱困環境：國際社會（尤其是美國）的背棄、中共的武力威脅、戰後經濟的殘破、省籍的矛盾、國民黨的腐敗分裂，以及士氣低落、軍紀敗壞的殘兵敗將等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具有儒學素養並深信三民主義的蔣中正總統，提出了一套團結黨、國的思想綱領：鞏固領導中心、堅決反共、貫徹實行三民主義，以及將台灣建設為光復大陸的模範省。

根據這個綱領，作者於第三章指出，國民黨研擬了一套以軍人、青年，以及平民為對象的「忠貞戰」(allegiance warfare)總體戰略。接著，在第四章，作者以較大篇幅討論軍隊的政治作戰（以下簡稱「政戰」）制度、政治教育、以及政治工作。第五章指陳，在 1960 年之前，高中與大專院校的軍訓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活動，均由國防部總政治部（1963 年更名為「總政治作戰部」）主導。第六章敘述軍人對平民進行識字教育與政治宣傳、提供醫療、勞力、救災等服務，以及安置榮民的作為等。

整體而言，如作者自己所說，本書以敘述為主。（頁 20）全書中所呈現的

資料，又以軍隊中的政戰工作較為周全。這可能與作者曾受教於政戰學校並以政戰制度為碩士論文題目有關，另一方面也得力於李東明博士的協助。

除了敘述軍隊在有關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為之外，作者也試圖提出一些具有理論意涵的概念與觀點。首先，較突出的是，作者認為「政治作戰」(political warfare)與「政治社會化」均不足以涵蓋本書所說的軍隊作為。因為，這些作為的目的，相對於以武力摧毀敵人，在於動員全民的心智，忠貞團結以對抗敵人。所以，作者提出一個「忠貞戰」的新概念。然而，作者卻又將這個概念界定為「在受到明確敵人威脅時所進行的政治社會化」。（頁 15）因此，這個新概念，究竟是有助於釐清思路或反而徒增困擾，實不無疑問。

第二，傅岳指出，許多西方學者在探討文武關係時，都侷限於軍人干政問題，並將文人政府與軍隊視為對立的兩造，主張縮小軍隊的角色與活動以便於控制。他認為，以這個角度來觀察許多開發中國家與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，並不適當。以本研究為例，傅岳指出中華民國國軍不但在非軍事性範疇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，對國家整合與發展具有重大貢獻，而且不會產生干政的問題。這個批評，相當中肯，也是全書中較有價值之理論觀點。

第三，作者雖然自陳本書以敘述為主，然而具有價值判斷之陳述，隨處可見。不但所引述的資料，絕大部份是「官方版」，許多論斷也相當接近國軍的「正統」說法。例如，第四章結論所列國軍與人民解放軍在政工制度與作為的不同點，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。並且，有關政戰制度與政工作為的負面意見，也未見充分引述或批判。

最後，本書較大的弱點，在於忽略了「黨國」的大環境，而將軍隊的作為孤立看待，貶低了幕後國民黨所扮演的主導角色。其實，1950 年代的政工制度是國民黨當時進行改造以建立列寧式「黨國」的產物。「黨國」的特點是「以黨治國」，「以黨領軍」；黨國下的黨軍關係特色是「黨內有軍」，「軍中有黨」。軍隊黨部即是政工制度中的「黨工」系統。這個系統與以「政治部」（或「政戰部」）為主軸的「政工」系統，在組織與功能上，都有所不同。然而在實際運作上，卻往往緊密結合，難以區分。並且，若以從屬關係而論，「黨工」為主，「政工」為從；政工的作為必須受黨工系統的指導與監督。因

此，人民解放軍才有「政工即是黨工」的說法。¹這個說法，對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的國軍政工制度，也是適用的。傅岳博士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，可惜，他卻以本書的範圍「僅限於軍隊所執行的政治社會化及其相關作為」，而排除有關黨工的討論。（頁 70）

排除「黨工」的討論和忽視「黨國」的大環境，使得本書的價值大受傷害。因為：一，軍隊所進行的「政治社會化」內容中，有關「忠黨」的重要部份因此被排除了。二，作者對軍隊從事「政治社會化」工作的肯定，喪失了著力點。沒有「黨國」（即一黨專政）的政治環境，除非進行軍事獨裁，否則軍隊又如何能主動對社會進行「政治社會化」的工作？三，忽略黨國結構與黨對軍隊的領導，卻反過來說軍隊從事非軍事性的活動不必然導致軍人干政，論証之缺陷甚為明顯。四，如果「軍人干政」指的是軍人以武力脅迫或推翻文人政府，那麼這個概念基本上並不適用於列寧式「黨國」體系國家。因為，在這種國家之中，軍隊（武黨）在黨國危機時，可以合法接替文人政府（文黨），並以黨的名義成立軍事政府，而不需透過武力威脅或實際以武力推翻文人政府。中國大陸在文革末期進行全面「軍管」與波蘭在 1981 年危機時成立軍政府，都不能說是「軍人干政」，而是「武黨」協助「文黨」渡過危機。然而，這並不意謂黨國系統中沒有「控制軍隊」的問題。否則，中共即不必經常強調「黨指揮槍」的原則，台灣也不會發生「李煥（換）王昇（升）」（即「文黨」與「武黨」爭勝）的問題了。簡而言之，如果作者認真探討了黨國結構及其黨軍關係，「軍人干政」問題自然不必多費筆墨，而應轉而探討文黨與武黨的互動。五，作者跳脫傳統文武關係研究窠臼的主張，也將因未能交代政府如何控制一支政治角色擴張的軍隊，而受到質疑。Alfred Stepan 早在 1973 年即指出，拉丁美洲軍人干政的一個重要因素，即是軍人接受了反共、反滲透與反顛覆等訓練，因而加強了他們的政治意識與政治角色的擴張。²

¹ 有關構成政工（政戰）制度的「黨工」與「政工」系統及彼此間之關係，詳見 Cheng Hsiao-shih, *Party-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PRC and Taiwan: Paradoxes of Control* (Boulder: Westview Press, 1990), chap. 3、4.

² Alfred Stepan, "The New Professionalism of Internal Warfare and Military Role Expansion," in Stepan ed., *Authoritarian Brazil: Origins, Politics, and Future* (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73).

總而言之，傅岳博士這本著作，在開啓有關台灣文武關係研究領域方面，具有相當大的貢獻；在紀錄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國軍的部份角色與作為，並將之呈現於國際學術界方面，也是值得肯定的。遺憾的是，本書的研究架構與理論意涵較為薄弱。

鄭 晓 時
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